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民间发展研究

江 峰 著



武汉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民间发展研究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研究/江峰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430-7948-9

I. ①马… II. ①江…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2116 号

著 者:江 峰

责任编辑:方 雷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黄冈师范学院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前 言

一般来说,从国家和政党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认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大家已经熟悉和重视的路径,这一路径无疑是十分宽广的,因为第一,历史的基本事实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研究路径,使之更为注重从国家和执政党意识形态入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早期主要是经由俄国,通过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传播到中国,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从而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其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诸原理在中国的显扬,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紧密关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并且使自身发展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这一历史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性质,而且也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的性质。这样,人们比较注重从国家和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认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问题,循着历史的脚步追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迹,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点也使人们更为重视从国家和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路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代表最先进的无产阶级的革

命理论,其天然地具有立足于世界研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及其意识形态诸多问题的理论品质,它总是强调和突出自身理论和学说的阶级性、人民性,从宏阔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境域来研究与最广大人民利益相关的问题,因而,从国家和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路径涉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评析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应当说是一种尊重客观、讲究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态度。第三,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取得的丰硕理论成果,也使得人们从国家和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路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更具实效性。中国共产党在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积累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资源和财富,发展和创新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等,这些思想和理论成果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的集体智慧。人们从国家和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路径切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就能够从这些显而易见的思想理论成果之中获得大量富有价值的研究资源,得出合乎历史逻辑的、具有科学性的研究结论,从而使其整个研究活动更有实效。第四,学术研究还有一个面对社会现实的问题,从国家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出发,可以更好地从多个研究区域,感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问题。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理论指导的需

要,往往在一定时期通过不同的现实问题,以多种具体形式体现出来,只有从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出发,才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正确方向。

然而,中国共产党是由于其先进性,经过漫长而又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地下状态的弱小政党,发展成为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国家的伟大执政党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在中国所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本身就有一个从民间社会形态上升为国家和执政党意识形态,又通过国家和执政党意识形态在更高层次上影响、引领民间社会的发展过程,因而,当我们总是从国家和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路径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的同时,也不妨改变一下思维方式上的路径依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这一新的路径切入,来探讨、深思一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这并非否认和拒斥从国家和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路径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努力,寻求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路径,以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突破和创新。在我们看来,一种理论能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种文化能否不断地扩展演进,一种学说能否流转延续,其中一个重要之点就是要看其能否广泛深入地影响到民间社会,能否掌握较大范围内的民间人群,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就是要采取适当的民间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向更深更广的民间区域扩散;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长入中国民间社会,内化入民间群众的心灵深处,活化为民间群众的文化信念,占领民间思想文化阵地,引领民间群

众的社会生活;使由党和人民群众心血和智慧凝聚而成的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能够转化为民间群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深层化、普适化、理想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过程。从民间发展这一新的路径涉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既有利于在文化深层对我们国家与执政党的人民性进行阐发,也不失为一种全面体察、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的严谨学术态度。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传输者的考察表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路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具有一定学术研究根据,而不是一种无所凭依、随意妄为的简单学术研究意向和行为。

马克思本人就十分重视通过对民间群众现实生活的体察与思考来展示自身思想理论的人民性特点和民间普适化意向,其在诸多论著中都多次突出了自己的理论与群众现实生活的关联、突出了自己理论的人民性问题。如,马克思在进行哲学思考过程中,十分关注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着力批判脱离民间社会、脱离人民的各种哲学意向。他通过总结哲学史上的经验教训,力图从民间群众的现实生活中吸取哲学智慧的源泉,以体现其哲学的人民性,因而使哲学由哲学家个人冥思世界转变为探究来自群众生活实践的诸多问题,由超越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转变为对民间群众生活实践的现实关怀。他把民间社会中个体的人们作为哲学思考的对象予以对待,在考察古希腊哲学的过程中,透析了哲学家、法律与广大民众的关系:“哲学家本身是活生生的形象,是活生生的艺术作品,

并且人民看到,他们是如何带有可塑的庄严性从人民中产生;如同在初期的哲人那儿一样,在他们的活动形成普遍的东西的地方,他们的格言实际上是被承认的实体——即法律。”^①他突出了群众个体作为实体对于哲学、法律诸思想理论的重要意义,指出:“希腊生活和希腊精神的灵魂是实体,这实体最初作为一种自由的实体在它们中间显露出来,所以对这种实体的认识就表现在独立的存在物中,即表现在个人中。”^②并且强调:“实体通过他们的口说出一般的、简单的戒律;他们的语言——这还仅仅是借他们的口说话的语言,在他们身上展现出道德生活的基本威力,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政治生活的积极创造者,立法者。”^③他认为,在古希腊,“自然”主要是指人们的生活世界,包括“看得见的天空,生活的实体联系,政治和宗教生活”,^④他深刻地体察到,哲学要由自我审视变为关注民众的现实生活:“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⑤哲学应“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一方面要使哲学成为现实世界的哲学,另一方面要使现实世界成为哲学的世界。正如科尔纽所言,马克思“已经不是具有自由主义情绪,而是具有民主情绪了,因此,他希望不为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利益而斗争,而为民主主义即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因为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220页。

在他看来,重要的与其说是批判现存制度,不如说是从实践中改变这些制度”。^① 这些都说明,马克思本人是注重其理论的民间发展路向的。

马克思还客观地评析了古希腊关注民众现实生活的哲学思想意向及其历史发展。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把实体的主观性发展为“应有”的目的判断,将哲学家的主观目的变为独立的实体,由于这种抽象的观念是哲学家意识超越性的表现,因此,哲学家不再是“人民的真正装饰品”,而是用独立的抽象观念同人民的现实生活相对立。这是当时古希腊哲学的一个质的飞跃和转折,是对人民实体生活的离异。在苏格拉底看来,哲人是区别于他人的优秀人物,他们将自己的认识、观念变为哲学概念和判断。苏格拉底的意见是城邦的现实生活所不需要的,因此他受到了人民的审判。柏拉图的“洞喻”表明,人民在洞穴中看到的只是意见的世界,只有哲学家才能看到真正的世界,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看到“至善”这一最高理念、这一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充满光辉的“太阳”,这也把人民与哲学对立起来了,把意见和真理对立起来。亚里士多德则建立了一个等级哲学体系,把沉思的哲人与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民区分开来,把人民群众实体的知识和伦理的、政治实践的知识区分开来,认为哲学家主要关注的不是提供处世的知识,不是人间事务,而是研究实体,追求形而上学的无用知识。这种知识是最高智慧,它优越于其他知识,只有从事纯粹理论沉思的哲学家才是享有真正幸福和自由的人。在马克思看来,

^① 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三联书店,1963年,第243页。

只有偏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整体哲学体系,才有自由可言,因为这种整体哲学体系,实在是难以容纳自由精神,难以反映人民的意愿和要求。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等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对传统哲学已有了偏离,对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也有了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但是,伊壁鸠鲁只停留在个别的自我意识上,他主张的是一种消极的自由,是一种对世界的逃避。这就使他脱离了民众,脱离了政治生活,对现象世界,他只不过是抽象的可能性来予以解释,而不关心这种可能性的实现问题。马克思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中发现了一种自由精神,并对之予以了发挥,力图将观念中的自由付诸行动,以使哲学走向现实世界,使现实世界哲学化,这就使其理论具有重视民间发展向度的基本特质。

对黑格尔等人迷恋于建构自我完满的哲学体系,马克思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这些人没有使哲学的触须延伸于民众的现实生活之中,因而使哲学脱离了民众的现实生活。实际上,一切历史行动都是有物质动因的,都是由利益驱动的,人的异化首先是客观事实,而不只是存在于观念中,“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为人。”^①马克思强烈地反感哲学尤其是当时的德国哲学远离民间社会,隔绝于群众的现实生活的现象,他说:“哲学,尤其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6页。

审视,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鲜明对照。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起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①由此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意向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存在及其现实生活,就应该是哲学家进行主体沉思的最根本动因,“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都是“文化的活的灵魂”,“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②真正的解放是实际地变革旧的社会秩序,因而必须依靠“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发展来看,许多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也都充分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特点和民间发展维度,并十分注重通过对民众主体存在及其现实生活的思考和探索来予以彰显。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李大钊为例,就可以发现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的史实。李大钊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特点时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是一个最大的发见”,它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此点,都该首肯。”^①他还强调,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问题,必须是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他说:“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②民间社会作为整个人类社会个体存在的依托,自然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成的时空境域。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从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传入中国起就实质性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具体衍化过程。艾思奇、毛泽东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传输者、创新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民间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推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在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大众化与民间发展的较大交叉区域内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从民间发展路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重要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研究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

① 《李大钊文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224—225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196页。

新课题,有其国内外的文化环境条件和学术研究基础。从国外来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从文化的深层予以研究,对其文化推衍、流转规律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其他各类命题予以探讨,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如,乔治·卢卡奇(Gyotgy Lukacs)有“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有“文化霸权”的马克思主义,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有马克思主义发展“三阶段”学说,恩斯德·布洛赫(Ernst Bloch)有“希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乔治·诺凡克(George Novack)有“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恩若·伯奇(Enzo Paci)、马文·法伯(M. Farber)等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让·保尔·萨特(Jean Paul Sartre)等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有“新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吉尔·德勒泽(Gilles Deleuze)和菲力克斯·居塔里(Felix Guatari)等有强调把“生产注入欲望”、“欲望注入生产”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的把握尽管各有偏颇,但却都在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创构和深层文化反思,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民间社会中的文化影响力得到了持续的增长,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国外文化环境条件和学术研究基础;从国内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正全面展开。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本质特征、独特内涵、作风气派、语境叙事、社会根据、思想进路、模式方法、思维结构、核心价值、基本规律、经验教训、灵魂精髓、创新成果、理论品质、实践形式、战略策略以及全球化关涉等等诸方面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诸多学术路向,尤其是一些学者的研究,

已开始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问题。加之近年来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下,国学在中国民间的普及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有力推动,国学之风在民间盛行,许多民间人士对国学兴趣浓厚,对诸多文化现象也开始了积极的反思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已逐渐占据了较大的民间文化市场,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研究提供了更为良好的契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研究提供了宽广的学术理论背景;另一方面,国学日盛,形成了中国民间坚实的多元化传统文化平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条件。

然而,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路径的研究仍然显得比较薄弱,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文化发展路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还鲜为人们系统研究和高度关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向中国民间社会的不断渗透,使之能够对中国民间群众产生深刻影响,并逐渐被中国民间社会所接纳,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的有机组成元素。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这一过程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指导思想、以政党为核心对之进行普适化、大众化的过程相结合,共同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过程,因而对其予以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应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急需突破的全新课题。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存在着一系列难题,主要包括:第一,如何消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间发展的一系列观念误区,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间发展的自觉意识,努力建构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间

发展的全新观念体系?第二,如何通过多重维度,透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间发展的系统语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与和谐社会建构的关系进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与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外来文化的中国民间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民间化(尤其是思维结构性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民间演进与某些西方政党核心指导思想的民间演进实行比较研究?第三,如何客观具体地分析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间发展进程的正负向因子,以强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区域民间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优势,消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间发展的各种负向影响因子?第四,如何寻求不同区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间发展的有效推进模式,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间发展的多元区域推进模式进行分析比较和绩效评估,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社会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间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任务和要求进行阐述,同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流转机制和各类宗教文化在民间的某些有效传播路径,努力建构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间发展区域模式的优化体系,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间发展的区域特色?第五,如何在深刻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对接的核心内容的基础上,开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整合研究,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对不同区域民间文化进行纯化、改造和开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特点出发,对各类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进行全面的吸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特点出发,对各类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实行正确的引导?如何努力在民间社会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实现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整合与现代重构,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深刻影响和具体指导下,铸造民间社会和谐的灵魂,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效的民间互动机制,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如何运用战略规划理论、区域文化理论、社会学、未来学等多种理论和学科的分析方法、手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进行重点研究,从战略意义上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间发展的重点推进区域和重点推进内容、步骤和方向,为党和政府制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合理化意见?等等。这些难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这一主题研究之下,都迫切需要得到系统而又有效的破解。

在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语境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必须要突出一些研究重点。

如,马克思主义和谐文化特质就应该是研究重点之一。与以往各种文化形态相比较,马克思主义有一种能够吸引我们去考察和体证的内在的基本特质,这种内在的基本特质为中国人民所广泛认同,因而成为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奉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文化原因之一。而这种内在的基本特质,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谐文化特质,它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具有民间发展意向,使马克思主义能够真正走向中国民间社会所具备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马克思主义和谐文化特质,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所特有的和谐价值导向、和谐维护系统、和谐表现样态、和谐精神位格、和谐思维模式、和谐生态空间、和谐流转机制、和谐审美意念、和谐生命追求等现象、性状和形态之类的特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独特的和谐文化。现代中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具有现代和谐文化特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现代

中国,发展、强化马克思主义和谐文化特质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统筹协调、以人为本,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这些都决定了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必须要重点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谐文化特质。

再如,从多个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进行系统语境透析也应该是研究重点之一,它主要包括透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与和谐文化建设的关系;比较马克思主义中西方的民间发展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与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民间发展特点等等。因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放置在其文化历史大背景和社会现实大环境之下进行系统的考量与分析,才能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实现与中国多元传统文化的整体融合,转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民间文化,全面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从而对中国未来社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研究,作为一个富于开拓性的新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第一,它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间发展,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现代语境的营造和优化,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国民间更大范围内的根植,有利于民间和谐社会思想灵魂的铸造,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在未来社会生存发展空间的拓展,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风民俗、政治态度、财富理念、教育思想、学习观念、科技推广、宗教信仰、艺术创造诸方面的正确导引,其实践指导意义是相当深远的。第二,它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马克思主义